

●李刚 孙建军

从边缘到中心:信息管理研究的学科范型嬗变

摘要 学科范型的嬗变存在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两个路径。从内在理路看,欧美信息管理学科的发展走的是模拟“社会学”等实证社会学科的路径,中国走的是模拟“历史学”的路径。从外在理路看,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信息管理领域学科范型的转变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学科范型转变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并不可截然分开,外在理路往往需要通过内在理路起作用,学术共同体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内在理路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学科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再生产的机制,如果学术共同体觉得学科范型的转变危及自身的生存,不管是外在理路还是内在理路都会遇到学术共同体的阻断。目前,信息管理领域情报学的一支独秀,已经危及到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生存,这些学科在情报学化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发展方向,统一的信息管理学的诞生还有待时日。表3。参考文献25。

关键词 信息管理 学科范型 内在理路 外在理路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Almost every discipline wants to go to the center of the knowledge map because of holding the center means possessing academic resources. There are two ways to go to the center. One can be called “inner way”; the other can be named “outer way”. The “inner way changing” is often promoted by the discipline community, while the “outer way changing” is usually driven by the social, economic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udy comes from the library management. As an art and not a science, the former library management profession made great efforts to set up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the Library Management. The Western library science simulates the social science such a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However, th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borrows a lot ways from history scienc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ing in the IMS is led by the high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multimedia and other IT, and by the social factors, such as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economy. Today,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science discipline paradigm is also changed into the IMS discipline paradigm. 3 tabs. 25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isciplinary paradigm. Inner way. Outer way.

CLASS NUMBER G250

如果要寻找一个能比较完整反映现代学科演化“规律”性特征的学科,“信息管理”是极好的样本。这个领域在欧美被称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台湾一般翻译为“图书馆与资讯科学”。我国大陆地区对应的学科名称比较混乱。1992年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相关的一级学科名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包含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博物馆学等四个二级学科。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相关一级学科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与之相关的本科招生专业有三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我国从事这些学科研究和专业教育的院系一般称为“信息管理系”、“信息资源管理系”。本文将包涵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二级学科的这个学术领域称为“信息管理研究”。对于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研究范型或者

研究范式的研究,海内外学界文章并不少见。但是目前偏重微观层面的研究比较多,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视野,讨论学科范型的类型、流变及其复杂动因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欲以信息管理研究学科范型的变迁及其动因为主要研究内容,藉以讨论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变迁的“规律性”特征。

1 作为“辅助”与职业训练科目的图书档案情报学科

信息管理研究目前发育比较完善的学科是情报学,但是早期学科基础主要是图书馆学和档案学。虽然“图书馆学”一词最早由德国图书馆学家马丁·施莱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 1772~1851)于1807年提出,但是真正确立这门学科历史地位的是美国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1876年,即美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美国的图书馆工作者创办了 *American Library Journal* (1877年更名为 *Library Journal*),杜威任

首任主编。1876年10月4日至6日,美国图书馆员在费城集会,会议成立了美国图书馆学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简称ALA),杜威任首任秘书长。1887年,他在哥伦比亚学院设立了图书馆管理学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开创了世界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1]78-81}。大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图书馆学基本独立于其他领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把图书馆学看成是一门辅助学科的观点一直流传下来。直到1934年,金陵大学著名教授刘国钧在中国图书馆学的经典——《图书馆学要旨》中仍指出:“图书馆学是教育学和社会学的一支。但图书馆学也可说是一切研究任何学术所必须的工具。”^[2]

“档案学”比“图书馆学”更早尝试建立独立的学科。1804年,德国学者约瑟夫·奥格一本论述文书分类的著作作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一种档案学理论思想》。1806年,德国档案工作者又出版了《档案学和登记室学》杂志,但该杂志很快夭折。1834年,德国一些档案工作者又创办《档案学、古文书学、历史》杂志,使用了档案学的概念,但这个杂志1836年就停刊了。1885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格鲁在巴黎出版的《国际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关于档案学的科学”一文,提出档案学应当是一门独立科学的见解^{[3]263}。就学科建制而言,近代档案学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比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早一些。182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布了建立文献学院(也有人译为档案学院)的法令,主要课程是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它与1854年奥地利维也纳成立的“历史研究院”、1894年德国马尔堡档案学院是欧洲档案教育史上著名的三大档案学院。但是,在整个19世纪的欧洲,档案学都是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面目出现,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

在中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也一直是弱小的学科。1949年之前,档案学根本没有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图书馆学的状况要好一点。1913年,南京金陵大学在文科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而第一所图书馆学校则是1920年成立的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其后有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科(辅修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图书馆组、上海图书馆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等^[4]。1949年以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校在院系调整时并入武汉大学。20世纪50年代前期,除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外,北京文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吉林师范大学都曾先后创办

过图书馆学专业,但是到50年代后期,除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图书馆学系外,其余都先后停办了^[5]。直到1978年以后图书馆学与图书馆教育才有新的大发展。1980~1990年,中国的图书馆学专业数量从2个增加到52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类高等院校中^{[6]3}。

193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标志着我国档案教育的问世。1939年,该校兼办一年制的档案讲习班,1940年正式改为两年制的档案专科,1947年后又改为三年制。1946年,殷钟麒等人在重庆创办了一所私立的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可以说,档案学教育是图书馆教育的副产品,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1952年,由于档案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修班,1955年在此基础上成立历史档案系^{[3]201-202}。档案学获得了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地位。吴宝康先生指出:“建国前,曾经实际上存在着档案学是历史学的一门科目的观点。建国后,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特别是苏联档案学的知识过程中,也曾接受过档案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门辅助科目的观点,也就是说认为档案学是一门辅助科目,属于历史科学。直到目前,国外持这种看法的国家和人还是不少的。”^[7]

1937年,国际书目协会再次更名,称为“国际文献联合会(FID)”。1943年,布拉德福发表了“布拉德福定律”。如果以这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事件为起点,情报学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情报学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四个里程碑:文献规律的研究和文献加工;机器自动查找情报;情报系统的建立和数据库的出现;信息管理的结构转变。在其发展过程中,情报学理论、情报技术和情报事业活动构成这个领域发展中的三大基本内容。”^[8]在国际情报学诞生40余年之后,中国情报学专业教育在图书馆学、档案学基础上诞生了。1978年,武汉大学创办了科技情报专业,招收了第一届科技情报专业本科生。此后,吉林工业大学、北京大学、西安电信工程学院、南京大学等一批院校相继设立了科技情报专业,情报学教育在全国兴起^{[6]3}。

从研究和教学内容来看,虽然出现了图书馆学、档案学和情报学的分别,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学科即使挂了“XX学”名称,本质上还是一种“术”。梁启超说:“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9]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主要内容集中在

工作方法、工作经验、职业训练,主要课程包括图书的分类编目、读者的服务方法、参考服务、文献检索、藏书建设、档案整理、档案保护。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是为图书馆工作提供合格的馆员,档案学教育主要训练合格的档案工作人员,情报学教育主要是为各级各类科技情报研究所培养资料调研管理人员,着眼点都是职业训练。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图书档案情报学科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地位,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2 “内在理路”——提升学术地位的学科范型嬗变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科学的成长并不必然是直线积累的,相反地,它大体上是循着传统与突破的方式在进行着。所谓“传统”是指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循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而所谓“突破”则指这一种科学传统积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新的事实无法做适当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这一门科学的传统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一方面突破了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了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0]。这个“传统”也就是库恩的所谓范型。“范型”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范型是指一门学科中特定共同体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1]157}。所谓学科信仰和价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同学科的学科意识。凡是认同社会科学的学科,一般都把实证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技术路线。学科意识、技术路线可谓学科范型。狭义的范型是指示范性的以往成就,一代宗师的成就本身就是学科学术成就的范型。范型和科学共同体有密切的关联,一个范型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型的人组成。大多数职业的科学家都能即刻回答出他们所属的共同体。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技术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一个范型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学科领域^{[11]158-162}。

简单地说,学科范型是一个研究领域内的学者共同体共享的认同与经验。一个领域内的学者共同体

认同自己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纪律(价值层面)、传统的学术典范(实体层面),这种认同程度的高低和学科的独立性与边界的清晰性关系密切。一个共同体内部学术经验的共享性是保证学科认同延续性的基础。在现代社会,随着学术工作的职业化,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虽有分歧,但他们也有着更为密切的利益联系。所以,每个学术共同体都希望自己从事的领域学科化、学术化,能在现代学术地图中占据中心地位,信息管理领域也是如此。

1887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时还叫“哥伦比亚学院”,以下简称“哥大”)创办图书馆学校。“由于招收女生,自始未经董事会的明确认可,加以又无经费、设备及场所,因此举世第一个图书馆学校,事实上只是哥大一个‘违法制造的单位’(Bootleg Unit)。”虽然连生存都如此困难,杜威并没有忘记要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第一学期结束以后,杜威向哥大董事会提出几项建议:①将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改为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②将校长、图书馆馆长及担任教学的所有讲师,列入其教员名单中;③规定该学校的入学资格,以大学毕业生或经考试及格者为限;④请董事会授权该学校得授予B. L. S. (图书馆学学士)、M. L. S. (图书馆学硕士)及D. L. S. (图书馆学博士)学位。但是哥大董事会明确否决了这几项提议,不同意改名为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的理由是“图书馆学是种技艺,而非一门科学”^[12]。

哥大董事会的理由并非毫无根据,杜威图书馆学校的主要课程结构特别重视图书馆管理能力和满足图书馆用户信息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实践环节的训练。杜威这种紧密联系图书馆实际工作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剥夺了图书馆员指导大众阅读的权威性,也限制了图书馆员成为一种类似律师那样高深职业的潜在能力。因为杜威对“图书馆员”职业未来的盲目乐观主义,他无法看清这种课程体系的缺点^{[1]95}。杜威想把图书馆学校变成哥大的一个正式学术单位,但是其完全是技能性训练的课程体系无法获得精英主义的大学董事会成员的支持,这无疑告诉图书馆学这个学术共同体——需要把自己的学问变得高深莫测,弄得像一门“科学”,才能挤进科学的圣殿。而图书馆本身的工作实践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图书馆学的进步基本上来自于图书馆学家们提升自己学术地位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搞出了一套完全脱离图书馆工作的高深理论体系,就是这一努力最好的例证。

芝加哥大学是1892年才成立的,但是,由于洛克菲勒的慷慨支持,首任校长哈珀(William K. Harper)的精心擘划、广聘名师,它很快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典型^{[13]70}。在学术史上以芝加哥学派命名的有芝加哥社会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芝加哥建筑学派(Chicago School of Architecture)、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芝加哥文学批判学派(Chicago School of Literary Criticism)、芝加哥电视学派(Chicago School of Television)等。至于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虽然为当今信息管理研究领域所公认,但是还没有获得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同。就存在的时间段而言,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兴起于第一个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之后,和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派大致一同衰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闻名于1915年。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领军人物帕克的退休和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加之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第一个芝加哥社会学派退出了历史舞台。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是所谓“第二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时期。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大致从1928年芝加哥大学成立具有博士学位课程的图书馆学院兴起,到20世纪60年代衰落。这个时段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鼎盛、失落与中兴的时期。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图书馆学的芝加哥学派完全从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派生而来,这两种学派之间的联系还缺少实证的研究。只能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的鼎盛给图书馆学院的师生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模拟”的榜样,他们希望图书馆学也能获得类似社会学那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如果我们了解芝加哥大学的校史,还必须注意:1929年,年仅30岁的耶鲁法学院院长赫钦斯(Robert M. Hutchins, 1899 - 1979)出任芝加哥大学第四任校长,他非常反对大学课程的反智主义、职业主义(vocationalism),强调学科知识并不完全涵盖人类智慧,大学教学必须重视科际学识与文明精华。他的《知识社会》(1968年)一书,使他被誉为倡导知识社会的先知先觉^{[13]70}。

赫钦斯主政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的鼎盛,无疑给1928年成立的年轻的图书馆学院追求学科化、学术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置身于美国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里的图书馆学院如果不能提供高度学术化的研究与教学,将是无法生存的。一直到1942年为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是美国唯一提供博士课程的图书馆学院。该学院不少学者来自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这批人对图书馆业务并不熟悉,他们把原来学科的信念和研究方法带入了图书馆

学。日本学者小仓亲雄认为这一做法使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身价倍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地位^{[14]33-34}。巴特勒(P. Bultler, 1886 - 1953)先后获得过哲学、文学和神学等学位,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时应聘讲授印刷史课程,1933年出版了《图书馆学导论》,该书在长达40年里一直是最主要的图书馆学理论教科书。他指出,图书馆人对自己职业理论方面的忽视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社会科学的方法。他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试图以社会学、心理学、历史的方法解释图书、读书和知识传播,其中关于读书的研究是作为读书科学展开的,而知识传播的问题是作为通讯论和社会认识论继承发展的。这些方面可以说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15]。韦普尔斯(D. Waples, 1893 - 1978)曾在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获得文学硕士与教育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创办时期的四位教师之一。他的最大贡献,是把社会科学中通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完整地带入图书馆学领域。1939年,他出版了《图书馆问题调查》,系统总结了自己近10年对实证主义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他的这种规范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影响了几代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学生^{[14]43}。伯埃尔森(B. Berelson)是韦普尔斯的学生,他把科学社会学的内容分析方法引入图书馆学,用来分析读书和知识传播问题。1941年,他的博士论文《舆论决定要因与传播媒体的关系》通过对报纸等印刷媒体中新闻标题内容出现频率的定量分析,论证了社会焦点问题及舆论的形成与印刷媒体的相关性。他的方法显然是标准的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使用并非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没有长时间的训练和主动的追求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伯埃尔森指出,图书馆学要成为一门“硬知识”,成为社会科学认同的学科,就必须采用和主流社会科学一样的方法。他指出:图书馆学研究的程序必须是公开的,所有涉及的假说、设计、概念都必须是经过明确定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必须是可以交流的,研究的经验数据是“能够公开获得的”,数据的收集必须是客观的,研究的结果也必须是可重复的、可“证伪”的。图书馆学的知识必须是系统化的、可以累计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解释、理解和预测图书馆现象^{[14]45-47}。伯埃尔森这些话无疑是对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最好的总结。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图书馆学提升其学术地位的主要路径是“图书馆学的科学化”。

比较而言,中国的信息管理学科学术地位更为低下。档案学在1949年以前还没有产生,情报学直到1978年以后才算真正登上学术舞台,如果把1920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成立作为中国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那么在1920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图书馆学提升自己学术地位的主要路径和美国所走的“社会科学化”完全不同。因为,历史学一直是中国的强势学科;相反,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相对而言非常弱小。1949年以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基本上被逐出大学的学科建制,所以中国图书馆学提升自己学术地位的路径不可能是“社会科学化”,而是“历史学化”。清代,考据学鼎盛,目录、版本、校勘、训诂之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峰。概而言之,这些学问都是一种文献研究,它们和现代图书馆学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所以当现代西方图书馆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们很快发现这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西方图书馆学核心之一是“图书分类学”,而当时的中国学界把分类学看成是目录学的一部分。蒋元卿指出:“目录学者,学中第一紧要,读书之唯一门径也。”他说:“类居部次之法,实可为目录学之灵魂也。”^[16]本来第一代中国图书馆学家们就国学根底深厚,当他们用现代图书馆学方法组织中国传统材料时,自然得心应手,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中国的图书馆学笼罩了浓厚的史学氛围。刘国钧这位中国图书馆学大师,同时就兼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这种崇高的地位是美国图书馆学家不敢想象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可以追溯的源头有两个:一是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二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刘国钧就是后者的灵魂人物,他除了《图书馆学要旨》这本名著之外,对于中国书史、中国印刷史、中国哲学史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小缘这位获得美国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学者,早年就以《英国国立图书馆藏书源流考》著名,后又积十余年功力编辑了《云南书目》^[17],该书至今被史学界看成是研究西南史地、对外关系的经典。著名史学家王绳祖评价说:“它提供的资料达三千种”,“尤其可贵的,是《云南书目》著录了好几百种外文资料”,“以内容而论,《云南书目》可谓囊括古今,网罗巨细,的确是国际目录学的一项优秀作品。”^[18]王重民的敦煌学、目录学史、古籍善本研究在民国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古籍校读法》、《四库提要辨证》(1935)、王献唐的《关于图书学之一部》(1930)、裘开明的《美

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历史科学类》(1930)、袁同礼的《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2)、姚名达的《目录学》(1934)、《中国目录学史》(1938)、杜定友的《校讎新义》等,都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图书馆学现代经典。这些著作的影响也并非局限在图书馆领域,至今对历史学、文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尚有影响。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机关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也发表了大量基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图书馆学成果,各种古代专题书目、地方书目近20余种。笔者统计南京大学馆藏《图书馆学季刊》的借阅者发现,1949年以来,南京大学借阅该刊的主要是中文、历史等系科的师生,这说明了它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图书馆学界提升学科学术地位的路径是“史学化”,那么1949年之后的情况又有不同。1978年之前,从事图书馆学与教学的人太少,研究成果太少,加上政治化的学术环境,图书馆学能够存在已属万幸,所以看不出提高学术地位的特别努力。1978年图书馆学恢复以后,学科弱小,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革”后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走上高校教学研究岗位,他们对学科学术地位状况不满,认为图书馆学、档案学还没有摆脱职业训练的水准。他们推动学科范型改变的路径已经不是“史学化”,而是从自然科学和管理学汲取理论方法,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一时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主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喧嚣退去,回望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和这三论有关而能存留在学术史上的屈指可数。可以说以“自然科学理论”改造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取向基本上是失败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管理研究领域进入了多元的、众声喧哗的时期。“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这个少见的一级学科名就说明它缺少共同的理论基础,维系学科统一性的因素主要是技术与建制。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的主要技术手段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与互联网。这三个学科是历史地被安排在共同的大学教育建制之中,这也是维系学科统一性的重要因素。其实,从事信息系统开发的情报学和从事中国图书史研究的图书馆学亲缘性到底有多少?可是这些毫无共同语言的学者们就处在一个学科之中。从整个大的一级学科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报学一枝独秀,图书馆学、档案学被进一步边缘化,数字图书馆、电子文件管理这些和情报学关系密切的

领域得到大的发展,图书馆学、档案学逐步情报学化。1992 年“情报”改“信息”后,情报学进入信息管理阶段,其实就是情报学的计算机科学化,情报学靠近了知识地图的中心位置,图书馆学、档案学也搭便车往知识地图的中心靠拢。整个的“学科范型”已经计算机科学化、管理学化。从招生就业看,信息管理学往往好于文、史、哲这些老牌学科,似乎近 100 年来提升学科地位的努力已经达到目的。可是,在图书馆学、档案学科目名称变换的同时,学术共同体自身的知识结构无法完成相应的转换,“新瓶装旧酒”倒使图书馆学、档案学的传统特色面临丧失的危险,整个学科范型面临认同缺失,分崩离析的局面。可是,这个过程已经不是学科范型嬗变的“内在理路”可以解释清楚的了。

3 “外在理路”——社会信息化与技术推动的学科范型嬗变

学科范型的嬗变不是完全从“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上文提到,美国图书馆学学科嬗变的路径是“社会科学化”,而中国图书馆学、档案学学科嬗变的早期路径是“史学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是“管理学化、计算机化”。但是,这种解释具有局限性。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图书馆学学科的嬗变主要不是出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推动,而是信息技术发展等外部因素的拉动,学科发生了“情报学化”转型。而中国信息管理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档案学的转型更为剧烈,而且导致这场转型的因素比美国更复杂,其中包括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等。可以说中国图书馆学、档案学的转型是整个社会市场化、信息化转型的一部分,而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导致学科转型的重要原因。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计算机文献检索技术发展很快,出现了“研究用电脑或类似的自动装置处理或传送信息的科学”^[19]。美国图书馆界很快把这种技术引入图书馆工作,开始了图书馆学又一次提升自己学科地位的努力。“从 60 年代早期起,图书馆学院不断变革,将情报学和文献学的新研究成果整合到图书馆学核心课程中。”^[20]1962 年,美国匹兹堡大学首先将图书馆学院改为图书馆与情报学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21],这一改动迎合了信息技术发展的大潮。到 1990 年,ALA 认定的美国图书馆学院中,88% 的院

名含有“Information”一词。

院系名称的改变反映了美国图书馆学界对信息技术变革的敏感,也是美国进入信息社会后图书馆工作转型的需求。图书馆工作在进入网络时代后,记录格式、存储方式、管理方式、服务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图书馆工作的“计算机化”与“网络化”,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Information 化的过程,图书馆的所有业务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重组。类似的过程发生在图书馆学内部就是以情报学化为基点进行学科的重组,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图书馆学、档案学的情报学化。1982 年,美国对 62 所图书馆学院进行调查,发现各学院信息处理方面的课程大幅增加,其中计算机编程、信息检索课程增加最多。到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图书馆学院已经不再把传统的“图书分类编目”列在核心课程之中,相反,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网络、软件编程、数据库技术、数据分析和 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咨询、组织信息系统分析、局域网、互联网、信息政策等课程大量出现在课程表中。大多数图书馆情报学院已经不把图书馆员和档案馆员作为唯一的培养目标,而是转向培养更多公共机构需要的人才,培养能满足商业和政府机构管理信息需求的人才上来。据有关统计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每年约有 15% 的图书馆员到其他行业工作,平均每 6 个图书馆学院毕业生中至少有 2 个不在图书馆工作,而塞伦对 487 名信息服务人员工作性质的调查中发现,73.51% 的人曾在各类图书馆工作过,并拥有图书馆学学位。这些被调查者中目前 11.07% 拥有自己的公司,8.83% 是无固定职业的图书馆员,88.5% 从事固定的工作(分布见表 1)。

表 1 前图书馆员的新工作

工作性质	比例(%)	工作性质	比例(%)
管理性工作	29.57	信息经纪人	10.06
咨询员	21.77	书目编纂	9.65
研究人员	19.10	编目员	7.06
营销/促销	18.20	档案管理	6.78
编辑	17.45	图书评论	4.11
信息管理	17.04	出版商	3.70
用户服务	14.58	文摘员	3.29
标引员	10.88	故事员	0.82
教师/培训人员	10.68	图书经销商	0.41
系统分析员	10.27	其他	12.73

上述数据反映了引入情报学成分以后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院对美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适应程度,反过来,社会信息化也必然导致图书馆学情报学科的进一步转型。如果不能应对这场深刻的社会与技术变革,那只有被淘汰。从1976年到1992年,美国有20所图书馆学院关门,包括非常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情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究其根本原因不外是缺乏财政支持和对信息业发展的忽视。随着IT行业的飞跃式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提供了大量相关就业机会,大学也相应地产生了信息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信息和系统科学、通讯和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等系科专业。不过,一些图书馆学院虽然加上了“Information”的招牌,却没有抓住机会开设与信息科学有关的科目,也没有鼓励学生到这些领域就业。据美国《图书馆杂志》的一份年度报告统计,1970~1990年的20年中,大部分修读图书馆学情报学学位的学生还是到图书馆就业^{[14] 102-103}。

表2 图书馆学院毕业生在图书馆就业百分比(%)

1975	78.2
1986	86.6
1991	95.6

以上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其实图书馆学情报学毕业生到图书馆就业率的提高,也可能是因为图书馆本身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需要吸收大量既懂图书馆学又懂信息技术的人才,图书馆学学生当然成为图书馆吸纳人才的首选。但是,并不排除是因为图书馆学院对新技术的忽视导致关门歇业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总体而言,美国图书馆学界对社会信息化和信息技术冲击的反应是主动的,整个学科范型的转变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从图书馆自动化到网络时代的数字图书馆理论与技术,从单一为图书馆、档案馆培养人才到面向社会信息管理的需求,如果说图书馆学情报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科群中的中心学科之一,那么至少必须承认,这个学科已经从边缘向知识地图的中心迈进了许多,学科范型在社会需要和技术推动这些外缘因素的作用下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中国的图书馆学、档案学也面临着同样的社会信息和信息技术冲击的环境。面对这些外缘性的学科发展机遇,我国学界应积极主动。1978年,中国图书馆

学界就创办了科技情报学专业,学科内部也发生了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化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尤其是90年代以后IT行业和互联网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的生存环境,整个学科范型开始迅速转型。1992年,国家科委把“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这一改动理顺了多年来的名不副实的困惑。“Information”这个词大约在1350~1400年间就出现了,并非一个新词。1995年版的《兰登书局韦氏大学辞典》列举了其英文语义:①关于某一事实或情形的知识;②通过学习、交流、研究得到的知识或数据;③为公众提供消息的服务或雇员;④通知、告知;⑤起诉;⑥信息论中指消息的可能变数;⑦存储、输入、输出阶段的计算机数据。“Information science”是指用计算机研究、存储、管理信息的科学^[22]。信息是数据处理的产物,知识则是信息与人类经验及分析能力相结合的副产品。这个语义清晰的词在20世纪50年代却被翻译成“情报”,完全歪曲了原意。这个翻译也可能是有意的误读,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传统的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学术地位。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情报在中国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可是,随着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没有“信息”吸引人了。“信息”如日中天,1992年国家科委改情报为信息,真是神来之笔。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界心领神会,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立即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全国学界立马跟进,不久,全国相关系科几乎全改名为信息管理系或者信息资源管理系。但是,一些资深的情报学家却反对把情报学改为“信息学”,所以就出现了怪事。199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已经不再有情报学,而是替之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没有相应的研究生专业,到了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仍然称“情报学”。这种学科建制很不像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而言,本科专业是大口径的,到研究生阶段再加以细分。比如历史学系,本科就是大历史学专业,到了研究生阶段才按照二级学科,比如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分别培养。这是学科发展与教育的一般规律,信息管理学界违背这个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课程已经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与档案学,有些学校的图书馆学、档案学教学的科目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基本雷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个专业大有吃掉图书馆学、档案学的趋势。

表 3 XX 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管理本科专业核心课程^[23]

图书馆学核心课程	档案学核心课程	信息管理核心课程
经济学	经济学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系统原理与方法
系统原理与方法	系统原理与方法	概率与统计
信息导论	信息导论	信息导论
程序设计语言	程序设计语言	程序设计语言
信息传播技术	信息传播技术	信息传播技术
信息检索 I	信息检索 I	信息检索 I
信息存储与组织	信息存储与组织	信息存储与组织
Internet 实用技术	Internet 实用技术	Internet 实用技术
文献学	文献学	计算机图像处理
图书馆现代化管理	档案现代化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与软件工程
信息检索 II	文献保护与复制技术	信息检索 II
文献保护与复制技术	档案管理学	信息分析与研究
文献资源建设	科技档案管理学	大学物理及实验
目录学	科技文件工程学	

表 3 揭示了学科范型转变的信息。首先,无论是图书馆学、档案学还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它们的学科理论基础已经既不再像芝加哥学派那样以“社会学”等为基础,也不再像中国传统的以“历史学”为基础,而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基础,学科的理论基础已经管理学化。目前,整个学科已经被划入管理学领域,修读信息管理系课程的学生被授予管理学学位。这是学科范型的重大变革。其次,课程设置的科目已经符合“Information science”的标准定义(指用计算机研究、存储、管理信息的科学),和欧美的“Information science”几乎完全一致了。就学科整体而言,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已经基本被整合进“情报学”(即“Information science”)。另外,就 21 世纪以来的办学实践来看,信息管理系毕业生的就业面的确拓宽了,社会认同程度提高了。学科范型的转换基本完成。

4 结论:音调未定的转型之路

雅斯贝尔斯说:“大学是在一个制度架构之内完成它的任务的:科学研究、教学、学术训练、沟通。”^[24]学科就是基本的制度之一。任何学科都想在知识地图中占据中心地位,因为学科与知识地图中心的距离及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该学科作为“文化资本”的含

量,决定该学科的师生在学术社会里可以获得资源的质量与数量。正如 P. 布尔迪厄所说,学科之间的差异反映了社会差异,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等被认为是最重要、最高贵的标准学科不仅神话了这样一些学生,“他们常常来自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都相对优越的家庭”,而且也神话了这些学科的教授们,使他们在大学里享有“自如的特权”^[25]。所以,任何学科都想在知识地图中争取中心的位置,都存在一个从边缘向中心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学科范型嬗变的过程。

学科范型的嬗变存在两个路径:一是内在的理路,主要是学术共同体通过自身的学术积累不断突破学术发展的瓶颈,在这个积累过程中,弱势学科总是向强势学科学习,从理念到研究方法都进行“模拟”。现代社会科学就是模拟自然科学的结果。信息管理学科是从图书馆学这样一种职业训练科目发展而来。它的发展过程,如果从内在理路看,欧美走的是模拟“社会学”等实证社会学科的路径,中国走的是模拟“历史学”的路径。另外一个学科范型嬗变的路径是基于外缘性因素给予的机遇,也就是“外在理路”。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信息管理领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推动着学科范型的转变。往往外在的因素力量更为强大。也许正如一句

老生常谈的话——“社会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当社会存在这样的需要,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可能,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学科必然获得巨大的发展。信息管理学的产生正是如此。

问题在于学科范型转变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并不可以截然分开。外在理路往往需要通过内在理路起作用,学术共同体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内在理路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的信息管理研究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学术视野与知识结构并不能很好担负学科转型的历史使命,尤其是传统的图书馆学者、档案学者,他们的知识并未完全更新,这样即使有外在因素的有力推动,学科范型转变也步履艰难。图书馆、档案馆、情报资料工作虽然亦已信息化,但是传统的业务模式并未根本改变,也就是说除了信息管理,这些部门还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文献管理、文件管理、古籍管理人才,一般的“信息管理”出身的学生还无法很快适应这些部门的工作,这也是图书馆学、档案学等某些传统科目存在的现实依据。学科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再生产的机制,如果学术共同体觉得学科范型的转变危及自身的生存,不管是外在理路还是内在理路都会遭遇学术共同体的阻断。目前,信息管理领域情报学的一枝独秀,已经危及到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生存,这些学科在信息管理学化的同时,也在酝酿新的发展方向。比如,图书馆学开始回归历史学的路径,大力开展出版史、文献史、编辑学等研究。档案学中对知识管理的开辟,已经表现出良好的势头。到底学科范型如何进一步转变,音调未定,统一的信息管理学学科的诞生还有待时日。

参考文献:

- [1] Wayne A Wiegand. Irrepressible reformer: a biography of Melvil Dewey [M].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6.
- [2]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 15.
- [3] 吴宝康. 档案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4] [台] 胡述兆, 王梅玲. 台湾地区图书馆与资讯科学教育现况 [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1997 (58): 55.
- [5] 吴仲强. 中国图书馆学史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1: 40.
- [6] 吴慰慈.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与展望 [G].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日] 筑波大学图书情报学系编. 中日图书情报学研究进展.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 [7] 吴宝康.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11.
- [8] 卢太宏. 迈向第二个五十年的情报科学 [J]. 情报业务研究, 1990 (5): 225.
- [9]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71.
- [10]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284 - 285.
- [11] [美]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台] 胡述兆. 图书馆学大师杜威年表 [J].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 1998 (61): 65.
- [13] [台] 郭为藩. 转变中的大学: 传统、议题与前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4] 范并思. 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15] 袁咏秋, 李家乔. 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351.
- [16] 蒋元卿. 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7: 1.
- [17] 李小缘编辑, 云南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校补. 云南书目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8] 王绳祖. 《云南书目》1988 年版序言 [G]. // 徐雁主编. 李小缘纪念文集.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007: 420.
- [19] 姚健. 信息科学名称辨证——试析多学科共学名现象的历史原因 [J]. 情报资料工作, 1997 (4): 12.
- [20] Carroll C 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years 1940 - 1960 [M]. NJ: Scarecrow, 1970: 22.
- [21] [2007-08-22]. <http://www. umc. pitt. edu/media/pcc010521/sis100yrs. html>.
- [22]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6: 691.
- [23]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总体培养目标 [OL]. [2007-08-21]. <http://im. nju. edu. cn/teaching. aspx>.
- [24]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108.
- [25] [法] P. 布尔迪厄著; 杨亚平译.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2 - 33.

李 刚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通讯地址: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 210093。

孙建军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 2008-02-14)